

总第二十九辑 2007.3

程恩富 国家兴衰的「五个关键词」

许 斌 和我的美国老师交往中的点滴

聂辉华 学好经济学对研究生找工作有用吗？

刘福寿 中国经济不只是「二元」，而是拧了麻花

许文彬 巴特尔教授的迷宫游戏

储小平 让太太们退出企业的一次成功密谋

朱恒鹏 折翼的天使——医生怎么了

陈 宪 有些不公平要逐步取消

熊秉元 一个经济学者的足球回忆

李辉文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高鸿业先生

张晓晶 哈佛散记（二）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许斌，1965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学士和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95年至2003年任教于佛罗里达大学，获终身教职。2004年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学。

记得中学时班主任批评我文理平均用力，现在想来他是怕我没有比较优势。但上帝对我很眷顾，安排我从事应用经济学的职业。经济学先要有思想，作为文科生想法会多些。经济学也要有技巧，但又不需要达到数学或统计专业的高度，至少在应用领域是如此。文理平均用力成就了我从事应用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幸哉！作为学者我很享受阅读那些优秀的经济学论文，它们深邃、美丽、简单而又充满智慧。《经济学家茶座》刊登的不是经济学论文，但每期都能读到几篇清新而又充满智慧的美文。能和《茶座》结缘，幸甚！



经济学的简单与复杂

陈 宪

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的原理是以简单的结构表达出来的。初学者和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能够通过阅读或稍加解释即可理解。一般地说,越是结构简单的原理,其解释力就越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N. 曼昆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章,就是“经济学十大原理”。这是一位大师对博大精深的经济学的精彩概括。例如,原理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这就告诉人们,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当我们把一种资源用于某种东西的生产,就意味着放弃了它的其他用途。就像我们将时间用于为《茶座》写稿,就放弃了和朋友喝茶聊天。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必须放弃的东西,就是所谓机会成本。喝茶聊天就成为为《茶座》写稿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这一简单的概念对于资源配置有着极强的解释力。

也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的复杂,是指其研究过程,复杂是为了把研究做得规范。研究的首要,是能否提出有价值的科学问题,抑或提出假说。经济学也有天才,他们有着良好的直觉,能够提出好问题。当然,他们通常接受过良好的训练,有着足够的知识、经验积累。对大多数经济学人来说,不经过长期的观察、阅读和思考,即复杂的研究积累过程,是不可能提出好问题的。然后,我们要用各种工具、模型,并找到合理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对问题和假说进行验证。验证过程往往是复杂的。惟此才能揭示发生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这就是复杂的知识创造过程。就劳动的复杂程度而言,提出好问题,是更为复杂的劳动。

《茶座》的好稿子,都是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分析、评说林林总总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这里,既要故事好,还要把故事说好;既要原理运用精准,还要分析得通俗易懂。这个活与做复杂的研究工作相比,很难说哪个简单,哪个复杂。不过,要把复杂的现象说简单,没有做过复杂的研究,看来不行。



经济学家茶座

(第 29 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刘德久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系列《茶座》编辑部主任
《经济学家茶座》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编 辑

陈丹丹

【卷首语】

陈 宪 经济学的简单与复杂 /001

【国是我见】

程恩富 国家兴衰的“五个关键词” /004

高超群 经济决定论反思 /006

刘福寿 中国经济不只是“二元”，而是拧了麻花 /012

赵 刚 政府何以会“失效”？ /017

徐昌生 吃饭与住房并非生死冤家 /021

程亚文 保证食品安全，从保护农产品价格做起 /025

【学界万象】

许 斌 和我的美国老师交往中的点滴 /029

聂辉华 学好经济学对研究生找工作有用吗？ /033

朱 玲 友情提示：“浓缩语言 节约时间” /038

萧国亮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
致辞 /041

徐秋慧 大学里的评奖 /043

【学问聊斋】

许文彬 巴特尔教授的迷宫游戏 /048

陆 铭 在经济学停止的地方，思想前进了 /052

江金彦 经济学的语言、生态与文学气质 /057

董志强 让经济学成为一门可爱的学问 /062

富景筠 分析与预测——读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
会主义与民主》 /065

【经济随笔】

熊秉元 一个经济学者的足球回忆 /070

储小平 让太太们退出企业的一次成功密谋 /073

胥廷全 影响房价的传媒因素 /078

李仁君 股市中的赢家 /080

李文溥 老店 /082

陈惠雄 新捕蛇者说 /086

【经济评论】

- 朱恒鹏 折翼的天使——医生怎么了 /088
封进 合作医疗中的政府补贴给了谁? /096
陈宪 有些不公平要逐步取消 /099
卢昌崇 目标的实现与激励的相容——来自军队的启示 /102
姚益龙 中国民航有关管理当局应该学习一点经济学 /107

【生活中的经济学】

- 黄有光 男女有别——从何圻基近著《情是何物?》说起 /110
邹东涛 解析“新排队现象” /113
李洪侠 稀缺、选择与爱情 /117
俞炜华 当爱的边际效用递减时 /120
张军 请客的经济分析 /122

【经济学人】

- 李辉文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高鸿业先生 /125
谭国富 林少宫老师与经济学研究生培养 /130
赵峰 欧文·费雪的传奇 /133

【他山之石】

- 张晓晶 哈佛散记(二) /136
徐康宁 韩国为什么会引人注目 /142
赵泉 好政府? 坏政府? /146
陈宇峰 从日本人的排队说起 /151
朱铁臻 歌德堡之夜 /155

【经济史话】

- 胡海鸥 从明嘉靖的“改稻为桑”看政府干预的必要 /1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29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7

ISBN 978-7-209-04269-7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第098528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906

E-mail:chazuo4901@sohu.com

Blog:<http://blog.sina.com.cn/teahouse82098906>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172×232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4.00元



国家兴衰的“五个关键词”

程恩富*

最近,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和相关论著很受关注。“大国崛起”这个题目是应当研究,可以写的,但关键是做到完整准确。从目前的这个纪录片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大国崛起》中提到的9个大国,有些并不是“大国”,而是强国,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强国崛起”。其二,如果光谈崛起,还不能给人家一个完整的概念,这里面如何科学地归类以及展示它们整个崛起的客观历程、动因可能反映还不够全面,因而理应完整地描述强国兴衰或者国家兴衰,揭示其兴衰的多变原因。例如,同样是搞资本主义宪政,一个国家为什么先兴后又衰了?如果不全面地勾画,那么从知识角度、传播角度来说可能就不够完整。它兴的原因是什么?往往讲内因的时候,只讲自由、民主或者加上技术创新多一些,简单来说就是宪政制度和科学技术,这两条讲得比较多,最多再讲到文化、文艺复兴等。应全面分析强国的兴与衰,以及兴衰的外因和内因之间的互动,这样才比较完整。

当然,这样问题就复杂了,必须从诸多因素、诸多方面来观察。同一个制度,为什么靠这个制度兴,又会因这个制度衰呢?如果仅仅讲它崛起,到崛起为止,对它如何衰的方面不谈的话,那么有关制度的真实分析就不够深度,不够辩证。其实我们也看到,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也是属于小而强的,比如说以色列。以色列很小,但是它几十年就变强了,什么原因?这与他们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理念有关,不管是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至少是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观念和发展观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还有,它至少也和推行比较标准的合作制这样一个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和它非常重视科技、重视人才、重视教育密切相关。当然它还有外部因素和美国的大力扶持等等。总之,以色列的崛起是值得研究的。另外,新加坡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城市国家为什么会兴起,而且它是长期一党执政。新加坡的兴起在观念和制度上还受到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家和学者的猛烈批评,认为它是独裁,不民主。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和制度也会兴起,也会变成一个小而优的一个国家呢?还有比较小的卢森堡、比利时,都是通过发展几个重要产业,在几个重要的产业和科技上领先,同时人文指数和人均收入也比较高,排在世界前列。这就是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为何我关注的主题不是某几个大国的兴旺和崛起,而是国家兴衰。我们要找出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词或主要变量是什么。

在我看来,根据国家兴衰普遍的发展轨迹、机制、规律,至少要充分满足以下一个条件,或者说有一个条件非常领先,那它就有可能兴。诚然,在不同时代变量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有关国家兴衰的五个关键词或变量,就是科技、制度、文教、军事和外交。一是**科技**。究竟把科技还是军事列为首位?军事这一因素在古代和近代一定是第一位,即使二战以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尤其因为我这里要概括的一般变量,不仅要解释历史,而且还要揭示今后人类社会几百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规律,所以军事就不放在第一位了。同时,我们中国也主张和平强盛的,如果把军事放在第一位,那意味着中国发展的第一位要放在军事上了。可见,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军事因素在历史上的重大或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个历史现象我们并不满意,它是人类进化和文明不够的一个结果。人类越是进步和文明,军事因素越是应退到后面,直至不成为国家和人类发展的一个因素。因此,作为社会进步和现代国家兴衰的首因还是科技,它不仅推动生产力,使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影响军事变革、战争方式等等。二是**制度**。其中涵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科技管理制度等正负效应。我们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印度由相当于国民党的国大党等执政几十年,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印两个国家的发展绩效和强盛程度是反差明显的。另外,从战后日本和韩国的崛起,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三是**文教**。它既可以包括思想、观念,即价值观,也可以包括文化产业、教育产业等。观念、思想肯定属于软实力或软功。文教产业至少部分属于软实力、软国力的范畴。这个变量的作用日趋明显。四是**军事**。近现代以来的强国兴旺,大都是军事因素名列前茅。在目前国际强权政治和“新帝国”存在的世界格局中,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也不得不建立防御性的军事力量。五是**外交**。在中外历史上,政治、军事、经济 and 文化的对外交往和外交,也对国家兴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的国际社会,这个因素的意义越来越大。比如,当前日本时常不承认二战的侵略行为,实际上就失去了有效的外交能力,它想要变成强国来发挥作用的意图就受阻,说明其外交协调上有问题,失去了外交优势,韩国等就不会支持它“入常”。又如,当前中国对内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倡导构建合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和谐地区、和谐世界,开展多边和全方位的和平外交,在有所作为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将有利于我国的强盛。



经济决定论反思

高超群*

希腊的神谕告诫人：“认识你自己。”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城邦而言，没有什么比公民们对自己的了解更重要了。人们总是觉得很了解自己，但是最近 150 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不断地追求、崇敬、膜拜过很多东西，有时候甚至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极端义无反顾地冲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其实并不是真的认识自己。在我们自以为自由行事的时候，或许我们只是在不经意间听从某些观念的摆布？而我们自以为醒悟的时候，只是在听从另一些观念的摆布？对于认识自己而言，就没有什么比认识支配我们的观念更重要的事情了。只有认识了那些统治着我们的观念，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然后才能从这种思想的专制中挺身而出，才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那么，什么样的观念统治着我们

的生活，塑造着我们的人性呢？今天的中国究竟与以前有什么不同？是什么使我们变成了和我们祖先不同的人呢？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经济决定论的出现，并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确立了其统治性的地位。^①我所说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老式的、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关联的社会理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经济发展成为决定性的国家目标，成为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经济发展是我们这个国家得以建立、运行的哲学基础，是创造并且论证我们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它甚至给出了我们的生命意义。并且，它对我们实施了思想专制，让我们处于它所造就的新牢笼之中。今天，或许到了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并从中走出时代了。因为，当我们发现有一种观念主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其实很多敏锐的人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就我所知，如金观涛先生、秋风先生等。因此，这并不是本文的发明。

幸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要对它保持警惕的时候了。它可能造就了我们的偏见，并且还会不断地鼓励和怂恿我们对它进行膜拜。

经济发展能够成为主宰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族思想和心灵，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在古代世界里，历代圣君贤相致力于太平盛世的追求，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技艺，但他们从不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经济的重要性的凸现根源于西方国家的挑战，1860年代以后，经济以富强的名目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但直到1980年代之前，经济仅仅只有在当中国与世界各国相抗衡的语境里才有意义，单独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正当性，顶多是使我们原有的政治技艺更加丰富而已。也就是说，它一直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之外徘徊。中国人从来也不认为发展经济、追求物质享受是人的权利，有其自然的正当性。这种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未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向往过上更舒适的日子，只是人们认为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那么令人满足。在中国人追求的未来国家中，发达、活跃的经济生活，丰富的物质享受绝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决定论也还未充分显形，更不用说占

据统治地位了。道德理想国虽然已经崩溃，但统治阶级和人民的联系却得到了加强，统治阶层在“文革”中短暂的民间生活，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和呼应民众的需要。统治阶层还在努力领导着国家，要把整个民族带入一个新国家，改革就是改进自己的统治。引领着80年代的是希望，是河的对岸，经济只是我们过河的手段。然而1980年代末，人民和政府都开始退缩。从此，统治阶层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个时代的领导人再也不可能党内或者官僚队伍中出现，因为没有那样的土壤。不管因为什么，总之，政府开始退出人民的私人生活。官员们开始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倾向于让人们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式和内容，而不再从道德上指导人民。他们这样做得到了认可和鼓励。改革成为利益分配，至少官员们是这样理解和执行的。人民默默地转身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和国家的血脉已经分离，国家是遥远的，与“我们”关系不大，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为国家努力过了，剩下的时间应该为自己打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伊人倒下了，只剩下我们在冰冷的河水中无所适从。动荡、残酷的政治生活使人们厌



烦,乃至幻灭。他们迫不及待地回到个人世界。在这种生活中,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于是陶醉于其中。他们甚至体会到了某种轻松,并把这种轻松当做自由。经济决定论安抚了受到挫伤的人民,开始的时候它只是生活的充填物,日子久了,人们开始相信水中的生活才是正当的、正常的。在活跃的经济中,人们是如此沉迷,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80年代的人和事,更不用说再早的祖先的历史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决定论登场并成为主角。

不过,经济决定论的出场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因为这种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背后并没有真的站立着一个强大的中等阶级。它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的结果,也不是经济权利或者政治权利转移的结果。历史地来看,它只是人民和政府暂时联盟的结果。其根源是失望、冷漠或者苟且,而不是自满的、得意洋洋的市民精神。因此,整个法律体系和风俗并不支持它。

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命运似乎有些类似于1895年后出现的社会进化论。在帝国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发生危机的时候,社会进化论应运而生,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新的、更真实的认识世界的观念,但它的褊狭最终使它无法成就一个新的国家。就中国与世界

的关系而言,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造反的奴隶的意识,通过它,我们可以确认自己的屈从的地位,并从这里出发开始反抗,反抗的方式当然只有模仿主人。社会进化论是一个工具或者桥梁,通过它,中国人与世界消除了沟通的障碍,产生了互动。虽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处边缘,但我们毕竟终于与世界发生了关系,有了自己的位置,不必再忍受孤独。有了这个扎实的基点,我们才拥有了建立新国家的虽然卑微但在当时人看来真实的起点。

应该指出,经济决定论是决定论,它与经济至上论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仅仅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事务,或者说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务,而是说经济决定着其他一切,经济可以取代其他一切。

因为是决定论,所以必然是排他的。和其他任何决定论一样,经济决定论认为自己抓住了根本性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决定着所有其他问题的样貌和解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它拒绝承认有与经济同样重要的问题,也拒绝承认有发展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样,它也认为所有的人在这一点都是一样的,这是正常的、自然的、本真的人性。如果有人有着不一样的看法,那一定是受到了错误观念的诱引和欺骗,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一定有着某些非同寻

常的东西。总之,某些东西使他偏离了正常的、清明的人性,而且这些错误观念是可以用理性来驱除的。

这种经济决定论往往还具有一种表面上的多元主义倾向,它似乎乐于承认人的各种不同看法都具有合理性,只要这种看法是出自利益分歧的。因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它也能理解别人的利益要求。即便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它也首先倾向于协商以求得互利。因为在经济决定论看来,没有绝对冲突的利益,所有人的利益都会通过某种安排得到满足。如果这种不同看法是没有利益诉求的,那它顶多具有审美的意义。因此,它所尊重的是不同的利益,而不是利益的主体;它要消灭的不是分歧,它所要求的也并非一律。

作为国家哲学,经济决定论意味着这样的一种主张: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其本质而言是经济竞争,而自由竞争的法则将保证经济上的成功者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与民族主义成功结盟之前,它实际上奉行着这样的一种世界观:繁荣是所有国家的愿望,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将保障合作者共同走向繁荣。而那些不信奉这种哲学的国家,迟早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由于它倾向于认为所有的国际冲突背后的根本因素就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因此,它对于那些政治的、权力的

冲突视而不见、无法理解,与那些坚持某种政治理念或者民族情感的国际力量很难对话、沟通。它逐渐谙熟了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对于国家的政治关系的构建却束手无策,对于文明之间的关系更加毫无意识。除了经济利益,它不能形成自己的权力主张。

因此,和平是经济决定论的外交哲学中的核心观念——如果不说是最高要求的话。这种观念认为和平是国际关系的自然的、正常的状态,所有破坏和平的力量都只是非正常的、偶然的、短暂的。

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发财致富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发财致富也是他摆脱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他据此来形成自己的关系网。他凭借关于利益的常识来判断和认识世界,来组织自己的世界。在想象中,他自己居于这个网的中心,并且统治着这个网。他也据此来决定自己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经济决定论牢牢地把每个人封锁在个人事务的牢笼中,限制他的眼界,闭塞他的心智。当他的个人世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开始动用自己的网络来化解危机,他不能从每次危机中感觉到更普遍的问题,每个人受到的侵犯都被理解为是个别的,每次侵犯都是例外的。在经济决定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土围子,都如同一只蜘蛛。网外的生活,使他感到茫然、畏惧。因此,



就其根本来说,它也意味着陌生人都不可相信的,如果这个陌生人不能被编制在自己的网络中的话。

而且由于原子化的分散,虽然人民中不乏卓越之士,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雄心壮志,也有着过人的才能、坚毅的性格,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是无力的。在强大的国家、复杂的经济社会面前,个人是那么渺小,而联合起来却又毫无可能。最重要的是,精彩的经济生活也可以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他们也可以让每个年轻人崇拜自己,甚至让世界尊重自己。从根本来说,由于每个人都陶醉在自己的生活里,谁还有功夫抬头看看公共生活呢。

经济决定论排他的手段并不是强制的、暴力的,而是一种更加聪敏和有效的办法。在经济决定论的统治下,任何其他的主张都必须换算为经济利益才是真实的、深刻的,才是可以理解和沟通的。因为有着广泛的、自发信仰的基础,经济决定论者可以非常顺利地实现这一点。在经济决定论眼中,任何严肃的政治冲突,都具有喜剧的一面,都具有强烈的表演的成分,在其背后都必然有着利益动机。而且,如同它改造民众的生活一样,它也会改造和构建我们时代的政治行为,所有的政治参与者要么主动地将政治表演化,要么被动地成为政治笑料。所有试图超越经济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除非具有娱

乐或者表演的效果,否则都是虚伪的。他们用嘲笑就可以轻易地化解任何挑战,就连严肃本身都变得非常可笑了。只有站在自己的利益这个基础上,政治才可能是严肃的、真诚的。

必须强调的是,经济决定论是处身于一个官民分立的社会,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霸道的、强势的哲学,它必须保证自己不动摇官民分立的社会结构。官民虽然有着同样的信仰,但民并不是出自对官的模仿,也不是因为官的教育。因此,二者之间在经济决定论面前是平等的。

有时候,经济决定论也试图衍生出一套更加完整的社会组织理论,打通官与民之间的鸿沟,让国家建立在每个人的心中。它以人的自利性为根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理性,社会也会自动越来越公平,政府和民众之间也会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它还相信自由的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好方法,因此,它往往暗含着人人市场面前一律平等的含义。它甚至暗暗期许经济发展会解决政体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会波澜不惊地建立民主制度,至少是法治国家。因为在它看来,人们都只是在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方面才会是真正当真的,而经济的发展总是会满足人们的这种追求。因此,各种冲突都只是发展的长期效益或者短期效益的冲突,或者只是经济

发展的成果的分配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发展可以最终解决的。它满怀信心地要求那些短期效益服从它所认为的长期效益,要求局部的利益满足全局的利益,要求利益受损的人少安毋躁。在内心,它坚信,经济发展的好处迟早会落到每个人头上的,虽然有多有少,有快有慢。

当然,对于经济决定论所提供的遥远的美好结果,整个社会其实都不太当真。人们懒得去思考那么长久以后的事情。这一代人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子孙着想,如同他们不愿意想起自己的祖先一样。不太当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经济决定论看来,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可以永远依靠的事情,任何为经济衰退的着想都是别有用心或者杞人忧天。它从来也不愿意相信一个政治体有可能要面对经济波动的严峻挑战。它常常认为,当经济发展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一切其他的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已经解决了。它以这种口实把其他的问题无限期地推延。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一种强大的惰性,哪怕政治问题已经逼到了眼前,它也缺

乏足够的敏锐去辨识它,也就没有能力面对它、解决它。经济决定论也堵塞了精英阶层的耳目,使他们只能看到眼前,只能处理临时事务,作为一个大国的精英阶层所必须具备的深谋远虑的品质在我们的整个精英阶层却极为罕见,它宁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好运之上。

在结束本文以前,有必要提醒读者,我并不认为对于我们民族而言,在今天,经济发展是一个可以忽视的目标。我也不认为,对个人而言,致力于发财致富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者说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在于发财致富,那么恐怕这种幻想不是那么牢靠,或许它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致命杀手。我也相信政治问题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正如经济问题并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一样。在今天,经济决定论的最大的危害莫过于它的膨胀,一切其他的主张都失去了成长的空间。它吞噬了它最初的主人,自己成为主人,它排斥而不是鼓励个人的独立、社会的发达和国家的繁荣。



中国经济不只是“二元”，而是拧了麻花

刘福寿 *

协调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说是新发展的第一大课题,也是第一大难题。近年来,中央制定了多项哺农惠农政策,加大了公共财政和投资向农业的倾斜,对农业生产、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村文化以及涉农工业都给予了直接的资金支持,而且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但是,效果如何呢?我把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的情况收集整理如下表:

2002~2006 年城乡居民收入的情况比较表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元)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2	2476	7703	32.1%
2003	2622	8472	30.9%
2004	2936	9422	31.2%
2005	3255	10493	31.0%
2006	3587	11759	30.5%

上表说明,这几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在拉大,看不出有扭转的迹象。改革开放近 30 年了,“一号文件”连连发,“增收减负”年年喊,可是在收入差距上至今不见改善,真可谓“三农”之难,难于蜀道!

究其原因,人们往往归罪于历史。历史无言。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是已经凿入本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是牵住了“牛鼻子”?

在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时,人们普遍使用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今天我们

* 作者系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

的经济现实要比二元经济理论复杂得多。比如说,“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传统部门”技术不变、边际生产率为零、剩余劳动无限供给、工资固定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收入差距 (范建平 绘)

等“假定”已基本不适用了。但是,像“现代部门”非熟练工人工资决定的“外生性”问题还是存在的,今天大量农民工的工资不是由“现代部门”本身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这就是农民工工资低的根本原因。另外,目前有些情况比刘易斯当时的估计还要严重。比如说,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刘易斯“假定”为 1/3,而我们今天的实际差距竟有 3 倍之遥。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农民所面临的绝对劣势地位,不只是收入差距过大,而是一个满拧的“二元一元麻花”。

所谓“二元一元麻花”,是指一种极不合理的利益-市场-保障结构:在农业产业比较利益低、农民工又受歧视的条件下,农民的收入水平只及城镇居民的 30% 左右,构成一个明显的“收入二元结构”;但农民却与城镇居民进入同一个市场,不用说在消费品市场上他们“享受”着同样的价格,就是连城镇居民都感到压力很大的医疗市场、教育市场的价格,也不曾对农民有一分钱的优惠,因此,市场是“一元”的;而在社会保障方面,情况却又来了一个反转的“二元”,即城镇居民享受着养老、失业、医疗、最低生活费等多项保障,农民却没有任何保障。于是,二元(利益)-一元(市场)-“倒二元”(保障),拧了“麻花”,一个令农民感到苦涩的“麻花”。

这个“麻花”的关键不在中间,而在两头。市场一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上只有“两个人”:供给者(厂商)和需求者(消费者),不问出身。所以,要“吃掉”这个“麻花”不能指望市场,关键是解决利益的二元化和保障的“倒二元化”问题。

要解决两个“二元化”问题,具体的措施已有不少。诸如:免征农业税,粮食生产直补,普及电力、信息网络,补贴农业生产资料工业,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



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力度,扩大农村低保范围等等。这些措施会很有效。但是我觉得,现在亟需解决的倒是观念问题。所以我想提出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要“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马太效应”是市场规律的一个重要表现,市场的效率原则决定了财富和贫困将向两极积累。强势者积累更多的财富,弱势者则是积累贫困。钱越多就越能挣到更多的钱,越没钱就越挣不到钱。农产品的提供者是分散的、细小的、无组织、无谈判能力的农民,农产品市场近乎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非农产品市场却往往是垄断的,包括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规模垄断(细小资本无法进入)、技术垄断、人力资源垄断(如工会)等。因此,农民是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他们讨不到便宜,如果完全靠市场,他们的贫穷地位不可能改变。所以,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把保护农业当做自己的重要职责。古代中国的政府是不大研究经济的,但是“抑商”却是一项长期的、传统的政策。“抑商”的本质是通过调控粮价、防止农村高利贷等措施保护农业。人们过多地注意到了“抑商”对中国工商业、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它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公正的。发达国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鼻祖,自由主义被他们吹得天花乱坠,如今更成了他们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大棒。但他们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措施之多、时间之长,往往出乎我们的想象。至今,WTO中的谈判最难的是农业方面的谈判,摩擦最多的也在农业方面。前不久,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访美,在与布什的谈判中,在国际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唯有在农业方面存在分歧。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支持力度有多大!我们反而不行,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指标体系(对农业的国内综合支持量,AMS)测度,我们是“负保护”。我们对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农业方面的教育、农村资金外流、人才外流等,在没有采取强力保护措施的条件下,就把它们推向了市场。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发达国家是用大于80%非农的人口保护小于20%的农业人口,而我们现在要20%的非农人口去保护80%的农业人口(如今大概是40%与60%之比)。因此保护不起。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腾飞都是从大农业起步的,发达国家走向了工农(或城乡)“一体化”的今天,其经验就是在国家的强力保护下,提高农民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然后向非农业转移,最终使农业与工业一起走向现代化,从而摆脱了二元困境。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受到批判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道出在政府的保护下使农业与工一起走向现代化的“真经”,而是仅仅把工业化看做是在放任的条件下由工业“吃掉”农业的过程。当然,作为人口大国和人均耕地资

源小国,我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走得那么容易,困难会比别人大得多,但越是这样,我们的措施就应该更加得力。否则,“二元结构”就成了永远跳不出的陷阱,农业就真的成为“口号农业”、“文件农业”了。在我们已经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的今天,政府已经有能力充分调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分配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以及立法等方面的支农护农作用,让农民的收入增长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稳定地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同时使农民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新发展观的确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理论的提出,说明从学界到政府都注意到了“城市本位”的危害性,政府已经担起了支农护农责任。但从运行的结果看,药力还不够“猛”,还不足以扭转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沉痾。新农村建设美好目标的实现,关键是各级政府要真正认识到支农护农是自己所面临的最重要、也最沉重的担子,因而痛下决心,勇敢地挑起这副担子,走下去,直至最终吃掉“二元一元麻花”。

二是解决“剪刀差”问题。这是一个颇具争论而且十分敏感的话题。到底有没有“剪刀差”,“剪刀差”到底有多大?人们众说纷纭。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普遍承认计划体制下有较严重的“剪刀差”问题,它是国家为工业化聚敛资金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其力度远大于农业税。有人估计,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内,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达万亿元,其中税收不足4000亿元,而其他6000多亿元则是“剪刀差”的功劳。但市场经济以来,价格的形成机制已由计划化变为市场化,“剪刀差”好像也就自然消除了。我看事情并非如此。过去由权力垄断造成的不合理比价问题是解决了,但其他形式的垄断依然严重的存在着。一边是完全竞争的农产品市场,一边是垄断多多的非农产品市场,这种市场态势造成比价扭曲是不奇怪的,“剪刀差”的存在有着必然性。我们常说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过低、技术产品价格过高,是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这种观点不是也可以用来反观国内吗?人们总是说,我国的粮食和其他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已不低于国际市场,已没有上调的余地。但是人们的直观感觉是,在美、欧、日、韩等国市场上,农产品(特别是蔬菜和水果)的销售价格都几倍于我们(参见拙作《关于“红薯换汽车”的联想》,载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13期)。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农产品的高价位呢?不管学术上承认不承认“剪刀差”的存在,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的农产品太便宜了,实际上是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剪刀差”在扩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我们的头脑里把粮食价格“政治化”了,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稳定农产品价格就是稳定社会,就是提高居民的富裕程度(即降低“恩格尔系数”)。